

文物中国史

中国国家博物馆 编



文物春秋战国史

彩色图文本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文物中国史



中国国家博物馆 编

文物春秋战国史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物春秋战国史:彩色图文本/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北京:中华书局,2009.1

(文物中国史)

ISBN 978-7-101-06461-2

I.文… II.中… III.①-中国-古代史-春秋战国时代-通俗读物②历史文物-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图集
IV.K225.09 K87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7903 号

书 名 文物春秋战国史(彩色图文本)

编 者 中国国家博物馆

丛 书 名 文物中国史

责任编辑 李洪超 宋志军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 //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精彩雅恒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5¼ 字数 280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6461-2

定 价 42.00 元

前言

这部《文物中国史》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中国历史与考古的专家、学者们合作撰写的一部图文并茂的著作。设定的读者对象主要是正在学习中国历史的年轻人或对中国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各界人士。在读者阅读本书之前，我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先向读者说明。

一、顾名思义，所谓“文物中国史”，是以文物为线索来讲述中国历史，这当然与一般主要依据文献史料讲述历史的著作不同。文物是历史文化遗存，每一件文物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是历史的实物见证，或称物化的历史。透过文物，我们可以更真实地感受历史。所以阅读这部《文物中国史》，要比读一般的历史教科书更生动，对许多重要历史问题的体会也会更深刻、更切近真实，因而也更适合青年人阅读。这是我们编撰本书的原因。

二、本书的作者都是在博物馆工作的专家，有着比较丰富的文物展览工作经验。所以，我相信读者读这部书，会有走进一座恢宏的历史博物馆的感觉。精心选择的、优美的典型文物图像，附以简练的文字介绍，使读者既可以了解历史，又可以领悟与欣赏文物，增加许多文物知识。这应该是本书最突出的特点。当然，据我所知，类似的著作在中国内地、香港以及日本都出版过，体例并非本书首创，但是由于本书作者们均具有博物馆专家、学者身份，故而本书在文物选择之得当与诠释之准确方面，应该是同类书很难达到的。

三、本书虽不属于学术专著，但是，从将文物、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结合，通过文物去研究、阐释历史方面看，本书显然具有较强的学术性。我认为，以文献研究为主的历史学只能称为狭义的历史学，如何将其更好地与考古学相结合，使二者真正成为历史科学研究的双翼，这个问题虽已开始受到历史与考古学界的重视，两种学科的交流、融合也不断产生着新的成果；但是目前大学历史学

科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似仍未能充分重视从文献史学与考古学两个方面全方位地培养学生，从这个角度看，本书对于促进历史学科教学的发展，特别是进一步合理化、科学化是有裨益的。

四、作为一部带有一定通史性质的著作，尽管是以文物为主述线索，仍需要有自己的科学体系，使读者能够看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较系统、较完整的过程。这是我们在确定这部著作体例时十分注意的。要保证体系的科学性，一个首要问题是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本书没有采取以往较常用的以原始、奴隶、封建社会等经济社会形态名称划分中国古代史发展阶段的做法。这首先是因为这种较传统的划分方式，固然有其理论依据和合理成分，但近年来中国史学界众多学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中国古代经济形态的发展做了更深入的探讨，并与世界范围内其他古代文明发展历程进行比较研究，对这一问题已经有了许多新认识。而且，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应是由各段社会形态特点的差异来决定的，仅以经济形态的一些变化来划分并以这些名称来概括也是不完全的。社会形态的划分，应综合考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方面。中国古代社会长时间处于独特的地理、自然、人文环境中，其发展在总体上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些共同规律，但同时又有许多自身的特点。鉴于中国古代文明作为世界几大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尤其是其从未间断过的悠久历史、广阔的地理分布，与在世界文明史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历程，无疑应该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模式之一。所以，关于中国古代史科学的分阶段、分期问题应该从这一高度做更深入的研究。本书以分卷的形式，每卷包括中国历史上一个时段。虽然并非是对中国古代史做上述意义的分期，而只是从本书编撰方便出发设计的，分卷亦即时段仍尽可能吸收了史学界与考古学界的多年研究成果，充分考虑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以若干王朝相聚合为一历史时段，与纯粹的王朝体系是不同的。被归为同一时段亦即同一卷的历史时期，在社会经济与政治形态、社会结构及思想文化发展方面均大致有其可以区别于其他时段的特点。

五、本书虽带有一定的通史性质，但是是以典型文物为线索展开叙述的，文字也要求简练。这样就不可能在每一卷中都像通史著作那样，对政治、经济、文化及事件、人物等都叙述得那么系统、详备，而是要突出时代特色，在叙述清楚各时段历史背景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以及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基础上，注意选择本阶段中那些最能体现社会进展，对中国历史进程乃至对整个世界文明史有较大影响的内容展开叙述，并不要求面面俱到。希望通过这样的编撰方法，使读者能够在熟悉文物的同时，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基本内容有一个较清晰的印象。

六、作为以文物为线索来展述历史的著作，最理想的是所要叙述的每个重要史实，皆有典型文物来体现。本书虽致力于此，但显然难以完全做到。所以采取了如下方式，即凡史实能与文物结合、有典型文物表现的，即多着笔墨，以合乎本书之主旨；而无文物可表现之重要史实，则出于上述通史体例要求而必有所交代，但行文则略为简短。

说明了以上几点，相信会有助于读者理解本书的内容。专家、学者们一般都有体会，写稍普及的著作其实更难，既要将专业知识用较通俗流畅的语言表述出来，同时又要准确、深刻，所谓深入浅出，实非易事。本书各卷作者致力于此，为能使读者满意，已花费了相当的精力，但不尽理想之处与疏误仍在所难免，我谨代表本书编委会与作者诚恳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教。

朱凤瀚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五日

目 录



总 说 1

第一章 政治形势 5

第一节 五霸迭兴 5

第二节 七国争雄 34

第二章 经济发展 47

第一节 农业 47

第二节 手工业 55

第三节 商业 80

第四节 城市与交通 89

第三章 制度变革 99

第一节 从世族世官到军功爵禄 99

第二节 从封邑到郡县 102

第三节 军事制度和作战方式的变化 103

第四章 民族大融合 113

第一节 中国、华夏和蛮夷戎狄 113

第二节 华夏国家周边的少数民族 114



第三节 华夷民族的大融合	130
第四节 大一统观念对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舆论先导作用	134

第五章 学术思想	137
第一节 士阶层的产生和诸子百家的分类	138
第二节 春秋时期的儒墨显学	139
第三节 战国诸子和百家争鸣	142

第六章 文化艺术	163
第一节 文字	163
第二节 文学	170
第三节 艺术	184
第四节 史学	198

第七章 科技探索	203
第一节 天文观测和历法	204
第二节 地理学	207
第三节 数学、力学、光学	210
第四节 采矿和冶炼技术	215
第五节 医学和养生	224

参考书目	228
后记	229

总 说

周幽王在位，昏庸暴虐，宠爱褒姒，废申后及太子宜臼，被申侯联合缙和犬戎攻杀于骊山之下，西周灭亡。前770年，太子宜臼在申侯、鲁侯等的拥戴下立为“天子”，这就是后来的周平王。前760年，周平王在秦襄公、晋文侯、郑武公等的护卫下迁都到成周雒邑（今河南洛阳）。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东周时期。

“西周”、“东周”是后代史学家为区分周代前后两个阶段而起的名字（当时的“西周”、“东周”并不是这样的概念）。它根据两周都邑的方位来称名：西周的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在雒邑以西，故后代史学家把武王到幽王十二王二百七十五年的这一段历史称作“西周”；雒邑在镐京以东，故后代史学家把平王至赧王二十五王五百一十四年的这一段历史称作“东周”。后代史学家有以都邑的方位来区分前朝前后阶段的习惯，如西汉、东汉，西晋、东晋，北宋、南宋等，都是以都邑的方位来命名的。

东周，又分为春秋、战国两个阶段。“春秋”是后代史学家根据鲁国史书《春秋》来命名的：《春秋》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记录了东周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故史学家把这一段时间的历史称为“春秋”。“战国”一词，原是指各国征战不休的意思。用这个词指代战国时代，始自西汉末年刘向

纂集的《战国策》。刘向《〈战国策〉书录》说：“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这是从当时列国争强、战争频繁的特点来给一个时代命名。战国的起讫年代，旧史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韩、赵、魏三家分晋与秦、楚、齐、燕并列为诸侯起，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统一中国止。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则把周元王元年（前475）作为战国的开始。现在为了记述方便，一般把周平王继位的前770年作为春秋的开始，把周敬王四十四年（前476）作为春秋的结束，把周元王元年（前475）作为战

【春秋】

- （一）平王宜臼 —— （二）桓王林 —— （三）庄王佗 —— （四）釐王胡齐 ——
（前770—前720） （前719—前697） （前696—前682） （前681—前677）
（五）惠王阍 —— （六）襄王郑 —— （七）顷王壬臣 —— （八）匡王班 ——
（前676—前652） （前651—前619） （前618—前613） （前612—前607）
（九）定王瑜 —— （十）简王夷 —— （十一）灵王泄心 —— （十二）景王贵 ——
（前606—前586） （前585—前572） （前571—前545） （前544—前520）
（十三）悼王猛 —— （十四）敬王匄
（前520） （前519—前476）

【战国】

- （十五）元王仁 —— （十六）贞定王介 —— （十七）哀王去疾 ——
（前475—前469） （前468—前441） （前441）
（十八）思王叔 —— （十九）考王嵬 —— （二十）威烈王午 ——
（前441） （前440—前426） （前425—前402）
（二一）安王骄 —— （二二）烈王喜 —— （二三）显王扁 ——
（前401—前376） （前375—前369） （前368—前321）
（二四）慎靓王定 —— （二五）赧王延
（前320—前315） （前314—前256）

前256年，周赧王死，周“天子”不复存在，但东周王城还盘踞着一定的王室势力。
秦庄襄王元年（前249），秦灭东周君，周彻底灭亡。

国的开始，把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统一中国作为战国时代的结束。

这样，春秋战国的起讫年代就是：周平王元年（前770）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共历时五百五十年。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大融合的时代。周自平王东迁，局促于今河南西部一隅之地，王室衰微，诸侯争霸，频仍连绵的战争和动荡中的建设对西周以来的宗法封建制度给予了致命的冲击，诸侯各国围绕争霸战争而进行的变法和改革，促进了宗法封建制度的衰落和地主封建制度的发展，促进了中国青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诸侯各国的兼并和外交联合，促进了地区之间的统一和生产经济的发展；中原华夏族与四周戎、狄、蛮、夷的交流和融合，渐渐泯灭了夷夏界限而形成了以中原民族为主体的华夏民族。战国以后，随着激烈的兼并战争的发展，秦、韩、赵、魏、燕、齐、楚几个大国通过变法，先后确立了地主封建的生产关系，原来的宗法贵族、官僚、军功阶层、商人迅速向地主阶级转化；各地区政治、经济不平衡性的减少和彼此联系的加强，推动了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和思想文化的百家争鸣。在这种形势下，崛起于西方的秦，凭借它强大的军事优势和正确的军事、外交策略，先后攻灭韩、赵、燕、魏、楚、齐而结束诸侯割据的局面，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空前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王朝。从此，中国历史进入大一统的地主封建社会。

第一章 政治形势

第一节 五霸迭兴

周平王被迫迁都雒邑，标志着周王朝在内忧外患中开始走上衰败的道路。春秋以后，王室衰微，诸侯坐大，周王朝虽然在名义上还被诸侯尊为“天下共主”，但却已失去了号令天下的实力和威权。号令天下的威权，实际上掌握在先后涌现出来的大国霸主手中，“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各诸侯国内的政权也逐渐下移。“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部族，乘王室衰微不断侵扰中原，与华夏民族抗衡、争锋、融合。这是春秋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

一、王纲解纽·威权跌落

周平王是在西周灭亡的形势下借助秦襄公、晋文侯、郑武公等诸侯的力量完成东迁的，所以东周政权从一开始就带有依附诸侯的色彩。其后，随着诸侯力量逐渐增强，周王室越来越成为诸侯的附庸。《史记》说“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其实，周王朝的危机自西周末年就开始了。周厉王任用荣夷公实行“专利”，使卫巫“监谤”，杀戮议论国事的人，结果被“国人”（住在国都及近郊的下层贵族、士和平民）暴动赶到彘（今山西霍州），这



春秋大国争霸形势图

是西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犯上作乱的大事。其后，周宣王虽号称“中兴”，但实际上并没有积蓄多大的力量，他军事上连续败于姜氏之戎，“丧南国之师”，已经没有实力再去控制和抵御周边少数民族部族的入侵。周幽王时，社会矛盾更加激化，他任用“善谀好利”的虢石父为卿相，废长立幼，引发了申后母家申侯联合缙与犬戎对西周的进攻，加上当时严重的地震等自然灾害，“赫赫宗周，褒姒灭之”，王位继承问题就像一根导火索，把国内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烈火点燃，终于把“赫赫宗周”烧掉了。

幽王被杀，西周灭亡，但周的王位继承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幽王被杀以后，申侯在鲁侯、许文公等支持下，立其外孙太子宜臼于申（今河南南阳），这就是周平王。不久，虢公翰为了抵制平王，又立幽王庶子余臣于携（后世称携王）。二王并立，衰败的周处于分裂状态，面临着新的危机。前760年，晋文侯仇执杀携王，周王室重告统一。不过，此时周已没有力量去驱逐犬戎等强悍部族，镐京又十分残破，于是只好放弃旧都，在秦襄公、晋文侯、郑武公等的护卫下从丰镐东徙雒邑。

“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周平王是借助秦襄公、晋文侯、郑武公等诸侯的力量才完成东迁的，所以东周政权从一开始就带有依附诸侯的色彩，与拥有赫赫威权的西

周不可同日而语。所幸当时诸侯各国尚未十分强大，西周以来的宗法制度对诸侯尚能起一定的约束作用，所以春秋初期周虽然有西部和北部的戎、狄之患，但因为周围有晋、郑、虞、虢、申、吕等诸侯屏卫，政权还比较稳固，与诸侯也没有太大的矛盾。

周桓王以后，周与原来最亲近的诸侯国郑国反目，繻葛（今河南长葛东北）之战，郑国军队把王室军队打得大败，周从此一蹶不振。后来王室又连续发生由王位纷争引起的内乱，力量越来越衰弱。之后，随着诸侯各国逐渐强大和争霸战争的加剧，周逐渐沦为诸侯大国的附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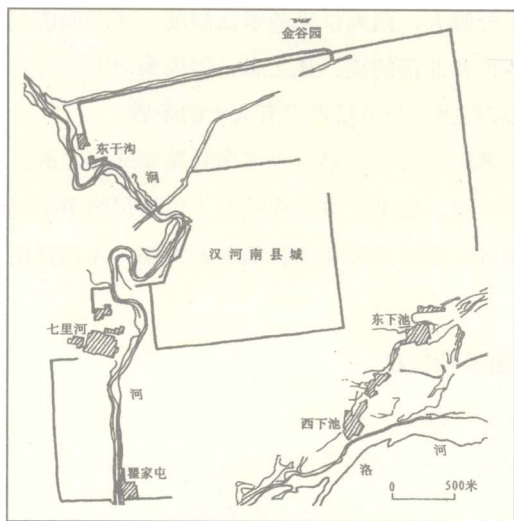
（一）版图日渐狭小

西周时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国”直接控制的土地从今陕西中部一直到今河南中部。西周灭亡时，宗周故地被犬戎占领。东迁以后，周平王为了报答秦、晋等国勤王的功劳，把关中岐山以西的土地赐给秦襄公，把黄河以西的土地赐给晋文侯等。这样，周东迁以后“王国”实际控制的土地不过今洛阳周围数百里。

春秋中期前后，强大起来的诸侯不断以各种借口索要王室的土地，使王室实际控制的疆域日渐狭小。如：前673年，郑厉公和虢公帮助周惠王平定了王子颓之乱，分别向周惠王索要了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以东和酒泉（今陕西省东部一带）的土地。前635年，晋文公帮助周襄王平定了王子带之乱，周襄王把畿内的阳樊（今河南济源东南）、温（今河南温县西）、原（今河南济源北）、欒茅（今河南修武北）等邑赐给晋文公。诸侯大国不断吞并王室周围的近畿小国，如：郑吞并了东虢，晋吞并了北虢，楚灭掉了申和吕。东虢、北虢是周西边的屏障，申、吕是周南方的护卫，诸侯灭掉了这些小国，就等于把周孤立在今河南西部的一隅之地，使其不得发展。除此之外，当时北方的少数民族部落（像扬拒、泉皋、伊洛之戎）也不断南迁到周王室境内。一些诸侯大国为了开拓领土，也把临近的少数民族部落往武装力量薄弱的王室领地赶，像秦国和晋国就把秦晋交界的陆浑之戎赶到王室的领地伊川（今河南嵩县、伊川一带）。这样一来，王室直接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到春秋中期，截长补短，



成周城垣遗址



东周王城雒邑遗址图

东周王城雒邑遗址是东周时代周王朝的都城遗址，位于今河南洛阳市涧河和洛河的交汇处。西周灭亡时，宗周为犬戎占领，平王迁都于此。自此至周赧王五十九年（前256）为秦所灭，周以此为王都近五百年。

规模上说，它应当是西周和春秋早期一座很大的具有政治、军事中心性质的古城。不过，和春秋中期以前建设的诸侯国都城相比，它的规模就有些逊色了。据考古发掘，建于春秋中期以前的新郑郑韩故城、凤翔秦都雍城、曲阜鲁国故城面积都在10平方公里以上，已等于或超过了洛阳东周王城的规模。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周王室确实已经衰微，诸侯的僭礼已经是普遍的事实。

（二）财政窘迫不堪

周王室版图越来越狭小，控制的人口越来越少，赋税收入锐减，财政也因此捉襟见肘，日渐穷困。

按照周礼，诸侯应该定期向周天子纳贡，畿内“王田”的收入也完全归王室所有。东周以后，诸侯的贡纳基本上停止了，直接控制土地版图的缩小使赋税收入大大减少，因此王室财政入不敷出，非常窘迫。无奈之下，周王只好不断派臣子向诸侯国去“求赙”、“求金”——收取丧葬赞助费和日常经费。如：周平王死，周桓王无力置办丧事，派使者到鲁国去求赙。鲁隐公六年（前717），京师饥荒，周王无力解决，派使者到鲁国告饥，由鲁国调剂宋、卫、齐、郑的粮食来救急。甚至周襄王没有车乘，也派使者

南北不过一二百里。这时的周王，名曰“天子”，实际上控制的土地仅相当于一个三等诸侯。而且王室的权力大都掌握在做卿士的诸侯手里，王室的矛盾，要借助诸侯的力量才能解决。

1954年至196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洛阳东周王城进行了全面勘探。王城城址略呈正方形，南临洛河，西跨涧河，除东南部因地势低洼未见城墙遗迹外，其余部分基本完整，北墙长2890米，城外有护城壕；西墙南北两端相距3200米；南墙、东墙各残留1000米。王城的西南部为宫殿区，南部为粮仓窖穴和手工业区，东北部为墓葬区。在城内还发现居民住址、排水设施等。

据考古工作者判断，洛阳东周王城遗址的城墙均建在春秋中期以前。从规

到鲁国求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周王室财政的拮据。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的求赙、求金事例都出于鲁国史书《春秋》，“周礼尽在鲁”，鲁国史书记载这么多周王腆着脸向诸侯求赙、求金的事，当时周王在经济上的尴尬境地可以想见。

（三）天子威权跌落

版图缩小，财政拮据，加上政治上的威权跌落，使周天子的“共主”地位徒具虚名。

周礼规定：周天子要定期“巡狩”天下，考核诸侯的政绩。而诸侯对天子应该“比年（两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定期向周王汇报诸侯国内的情况。入东周以后，天子“巡狩”没有可能真正进行了。《春秋》等文献虽记有不少“天王狩于河阳”之类的话，但这并不是周天子去巡狩某地，而是史官用“春秋笔法”为尊者讳。真实情况是诸侯“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们举行会盟，召见周王，周王不得不去。诸侯“朝觐”天子更是成了虚语。据文献统计，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与周关系最好的鲁国朝王仅三次，派使者问候周王仅四次。相反，为了与霸主周旋，鲁朝见齐国达十一次，朝见晋国达二十次；派使者聘问齐国十六次，聘问晋国二十四次。与周关系最好的鲁尚且如此，其他诸侯国与周的关系可以想见。

诸侯不仅不朝王、不聘问，原来最受周王信任的诸侯还经常因为争夺控制王室的权力与周王发生矛盾，甚至以武力压制和欺凌“天子”，使“天子”的宗主地位一落千丈。

最早与周发生矛盾的是郑国。郑的始祖郑桓公是周厉王的小儿子，封地在郑（今陕西华县），幽王时为司寇。郑桓公在犬戎攻杀幽王时被杀，其子郑武公即位。郑武公辅佐平王东迁有功，受平王倚重，被改封到东方的新郑（今河南新郑），本人则在王室做卿士。后来，郑武公的儿子郑庄公袭继父职做卿士，势力非常强大。周平王担心郑庄公篡权，就采取一些分权的办法来削弱郑庄公的力量，引起郑庄公不满，对周王采取了一些极端措施。之后，事态发展到双方各派自己的儿子到对方做人质来重申信任的地步。这样，周和郑原来的君臣主从关系就完全降到了国与国的平列关系，这在历史上称为“周郑交质”。前720年，平王死，继位的周桓王打算让虢公执政，以防止郑庄公专权。郑庄公恼恨之极，就派人抢周人即将收割的麦子，秋季又派人偷割周成熟的庄稼，双方为此结下仇恨，史称“周郑交恶”。前707年（鲁桓公五年），周桓王罢免了郑庄公卿士的职位，郑庄公出于报复，不去朝见周王，桓王便率蔡、卫、陈三国之师伐郑问罪，与郑军战于繻葛（今河南长葛东北），结果被郑军打得大败。郑国的祝聃一箭射中了桓王的肩膀，使“天子”威风扫地。后来，虽然有不少霸主打着“尊王”的旗号称霸，但目